

同乡网络与过度嵌入效应：以孙中山 1895—1911 年个人网的变迁为例

姚书恒

(中山大学 社会学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乌兹的研究指出，嵌入性提高了组织适应于当前环境的能力，但若过度嵌入却会减弱组织对网络以外环境的适应力，即嵌入性悖论。本研究运用关于孙中山个人网的大量历史资料，进一步讨论了嵌入性悖论的性质与后果。本文指出：在结构上，一方面，内部紧密联系、由庇护依附关系组成的同乡网络嵌入于合作性的整体网，动机、目标不尽相同的各个子网络由此为大网络带来巨大的张力；另一方面，孙中山同时身处精英网、同乡网、整体网之中。嵌入性为孙中山带来利弊两种可能：紧密的同乡支持网对孙中山在革命中帮助巨大，但各个嵌入在整体网中的同乡网络相互的倾轧却令原本同时处身各个网络之中的孙中山左右为难；本文一并指出过度嵌入的四个负效应：信任流失、资源竞争、目标冲突、权威弱化。

关键词：同乡网络 过度嵌入 负效应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在与经济学的论辩中，格兰诺维特提出“嵌入性”解释，意指经济与社会存在本质上的领域区隔，经济领域的行动者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并通过信任、合作关系维持经济关系与制度^[1]。及后乌兹将嵌入性纲领操作化应用到经验研究之中，在对 23 间服装厂结构嵌入与绩效的研究中，他提出，嵌入性是一种塑造动机和期望并且促进协调适应的交换逻辑，这个逻辑的独特性在于行动者并不总是自利，而是会培育长期的合作关系。乌兹认为，企业如果与一个由既有紧密联结又有市场交易关系的伙伴企业所混合构成的网络保持一种强联结关系，那么它就拥有更大的生存机会^[2]；在另一项同类研究中，乌兹把嵌入性视为一个变量，考察了中小企业如何及以何代价获得贷款的问题；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关系：一种是臂距关系(arm's length tie)，即具有即时性和非个人化特征的市场关系，另一种是稳定的带有情感关联的嵌入关系；他发现，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商业交易嵌入社会依附(social attachments)的程度越深，他们之间信任和互惠的期望就越有利于贷款的进行^[3]。但他更进一步指出，同样的过程，企业网络内部的过度嵌入在提高它当下生存能力的同时也会阻碍异质信息的进入以及降低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嵌入性对经济交换具有悖论性作用^[4]。

然而,学者们在使用嵌入性、过度嵌入概念说明经济行动与网络结构关系的同时,却未对行动领域内部的结构与性质的变化多加解释。换言之,社会关系是在各个行动者进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由不同动机、不同因素驱动而不断建构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会持续改变原本的利益格局、因果观念,并体现在社会网结构中。在实际运作中,行动者常处于多重社会关系组成的空间,这些不同层次的各个网络的共存与互相嵌入,是以同时处身于所有这些网络中的具有多种身份的主体为基础的^[5]。

本文将延续、深化乌兹对过度嵌入的讨论,以孙中山辛亥革命过程中所经历的事件以及他的个人网的结构变迁来分析历史进程中的行动者是如何建构不同的网络,不同子网络在大网络背景下的过度嵌入以及嵌入程度如何影响孙中山的行为。本文选择1895—1911年间孙中山为发动革命先后组成或参与的广东同乡网、湖南湖北同乡网、浙江同乡网、同盟会会员网,分析各网络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一方面,内部紧密联系、由庇护依附关系组成的同乡网络嵌入于合作性的整体网,动机、目标不尽相同的各个子网络由此为大网络带来巨大的张力;另一方面,孙中山同时身处精英网、同乡网、整体网之中。正如传统的对嵌入性的讨论所示,嵌入性为孙中山带来利弊两种可能:紧密的同乡支持网对孙中山在革命中帮助巨大,但各个嵌入在整体网中的同乡网络相互的倾轧却令原本同时处身各个网络之中的孙中山左右为难。除此以外,孙中山使用嵌入策略的过程也改变了政治权力格局本身,甚至影响到后来者参与政治角逐时的因果观念。

一、信任、竞争与收益

孙中山早期在檀香山和香港号召革命、聚集同志的行为尚未具有长远的规划,也没有建立稳定的组织结构,第一次广州起义的发动几乎完全依赖于松散联结的个人关系网以及网络内各人自有的资产、伙伴。同样的过程,黄兴、宋教仁、陶成章等各自同乡性强烈的个人关系网中心人物也是通过私人关系筹备资源发动集体行动。在漫长的革命过程中,他们各自的群体越发清晰地提出自己的行动纲领,换言之,动机出现了改变,从地方性、改良性的行为取向逐渐向全国性、革命性动机演变。这时,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陶成章等人如何扩大革命群体、建立互相信任的合作关系?他们又如何通过组织化或者共同的协调行为来创造或维系群体的认同?换言之,他们如何运用多重角色、多种行动策略来建立同盟关系,共同

在充满风险与机遇的革命之路上为自己的目标奋斗。本文将从各个同乡网络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来讨论网络结构的嵌入性与过度嵌入问题,指出过度嵌入的后果不仅仅存在于组织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上^[6],更是会对行动领域内部的结构与性质产生重要影响。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运用针对经济组织的网络理论来对革命组织进行论辩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概念上,作为追求盈利的营利性组织的企业,是一种自愿结成、受规范与经济秩序约束的社会关系,主要从事生产、流通与服务等基本经济活动^[7]。而革命组织则是一种提出自己意识形态、拥有一定内部结构的与现有政权进行竞争的团体^[8]。两者最大差异在其正当性基础上。对于营利性企业而言,尽管不同国家与文化框架下,人们对之的正当性理解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企业的正当性是建立在国家或地方法律的框架上的,它们被认为是理性化地追求市场效率与经济绩效的有效方式^[9];革命团体的合法性则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来源^[10]。虽然经济组织与革命组织的运行逻辑与合法性来源均有差异,但在具体的网络之间相互关系问题上,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被政治和经济社会学角度共同解释的信任、竞争、收益问题,来发展出一个解释革命团体内部各个同乡网与大网络之间的嵌入关系、同乡网络自身的特征与相互的竞争。在社会网与社会资本研究中,信任被认为是组织之间、网络之间降低监管成本、优先接触有价值信息、有利于交换资源的重要机制^[11];同样地,孙中山等人在联合各个原本分散的同乡网络时、在开展合作共同办报宣传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存在于私人关系中的信任,也是调度资源、降低控制成本、降低信息泄露风险的重要条件。至于社会网中的竞争,则是一种突现的关系,行动者在谋求最大化利润的过程中争取维持富有生产性的关系^[12];同样地,孙中山必须使用诸如联系身份不同群体等各种扩展、维持社会关系的方式,从而获得各网络的桥接者地位,发动反清革命。在收益问题中,参与社会网络、经济网络、政治网络同样意味着获得社会认可、获得不同信息、搜寻新的收益来源。简而言之,本文将在信任、竞争与收益这些被经济行为、政治行为共同关注的范畴展开讨论。

二、三个同乡网络的起源与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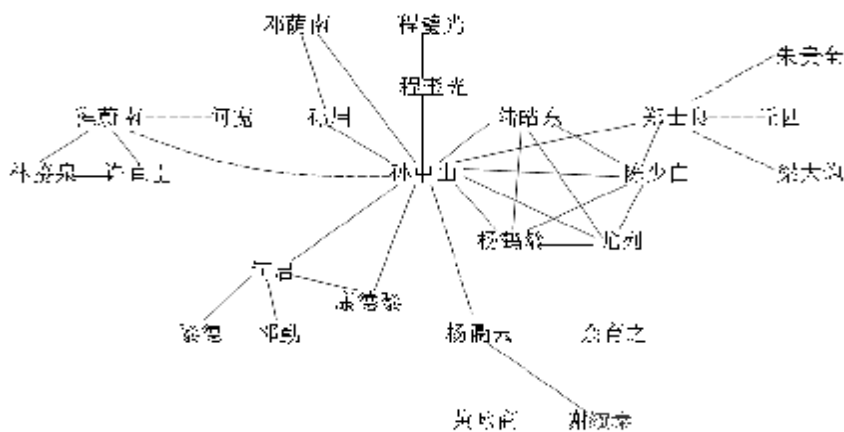
在辛亥革命当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是从原本已经存在的个人社会网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并拥有一个短期目标的新网络;当时发生的广州起义、长沙起义、安庆起义等革命运动,总是一再地由那些与领导人有密切联系的人发起、在与私人网络覆盖

的地方出现；这些都说明，个人关系纽带以及关系网络在当时革命中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1. 广东同乡网

在孙中山漫长的革命历程中，广东同乡一直伴随左右，构筑成一张紧密而稳固的社会网。在兴中会时期，广东同乡既是经费的主要来源，更是革命战事的先驱；到了同盟会时期，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始终是其心腹。相应地，孙中山及其社会网成员也一直以华南作为反满革命的起点，不断发动起义。

1886年，孙中山结识陈少白、尤列、杨鹤龄，这三人后来成为辅佐孙中山策划、执行广州起事的主要人物^[13]。1894年秋，孙中山回到檀香山，与哥哥孙眉一起联络在檀香山的广东同乡，成立兴中会^[14]。1895年初，孙中山抵达香港，商议与香港辅仁文社合并为香港兴中会总会，杨衢云、谢瓚泰加入兴中会^[15]。1895年3月，经会议决定，年末发动广州起义，此时，孙中山的个人网内各成员各有分工，并由私人关系连接起来，外围的人并未与孙中山直接接触，呈现出了中心——边缘结构（参见下图^[16]）。孙中山、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陈少白驻广州管理军务；杨衢云、黄咏商、谢瓚泰驻港负责接应；丘四、朱贵全集中会党；郑士良联络会党领袖梁大炮协议支援。



另外，根据张玉法对兴中会参与者情况的资料整理与统计^[17]，至1904年，共325人加入兴中会，按照籍贯和职业分类可以得下表：

籍贯	人数	比例	职业	人数	比例
广东	278	85.6%	商人	114	35.1%
福建	4	1.4%	知识界	66	20%
湖南	3	1.1%	工人	51	15.7%

湖北	2	0.7%	会党	44	13.6%
浙江	1	0.4%	农牧业	14	4.4%
四川	1	0.4%	军职	7	2.2%
旗籍	2	0.7%	不详	29	9%
不详	37	9.7%			

从图表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兴中会最重要的基础是以孙中山为中心人物的广东同乡网，这个同乡网络也是孙中山发动革命所需的军费的重要支持来源。

及至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革命联盟经多次分裂与重组，但是孙中山与其广东同乡所结成社会网都稳固非凡，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朱执信、王宠惠都是其肱股之臣。

2. 浙江同乡网

相似地，光复会也是以浙江同乡网络建立起来的行动主体，它包含了发达的贯穿于省内乡、镇、县的关系网络。这一同乡网络包括了同学网、会党网等各种网络而成为一省内联合的政治联盟。

1903年，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东京组建了以浙江同乡为主要成员的浙学会^[18]。与此同时，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领导着同样以浙江同乡为主的小群体^[19]。1904年，以浙江知识分子为主的光复会成立，特别以绍兴人为多^[20]。这时的光复会是以徐锡麟、陶成章、沈钧业、龚宝铨、陈子英为首的一个松散社会网^[21]。这个新组成的网络所持有的目标，是“驱逐异族”的“光复”，并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作为口号^[22]。在这个群体中，各成员间的联系方式以地区性的社会关系为主，每一联络方块专责每一地区的联络^[23]。这些以原属社区划分的社会联系被用作联络当地会党等具有一定武装力量的松散群体^[24]。徐锡麟联络闽浙会党；陶成章联络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头目；秋瑾创办大通学堂练兵，立志光复汉室。

据《光复会史稿》中所提及的光复会主要人物，整理见下表^[25]：

会 员	籍 贯	会 员	籍 贯
陶成章	会稽（领袖）	吕逢樵	处州（龙华会首领）
蔡元培	会稽（会长）	周华昌	缙云（龙华会首领）
章太炎	余杭（会长）	张 恭	金华（龙华会首领）

蒋尊簋	诸暨	沈荣卿	永康（龙华会首领）
龚宝铨	秀水	竺绍康	嵊县（平阳党首领）
秋瑾	绍兴	王金宝	青田（双龙会首领）
魏兰	处州	王金发	嵊县（乌带党首领）
徐锡麟	绍兴	敖嘉熊	嘉兴（祖宗教首领）

上表提及的浙江同乡网络，容纳了学界、会党等人士，是一个在浙江覆盖面较广的私人网。这些人也是创办大通学堂、发起皖浙起义、安庆起义的主要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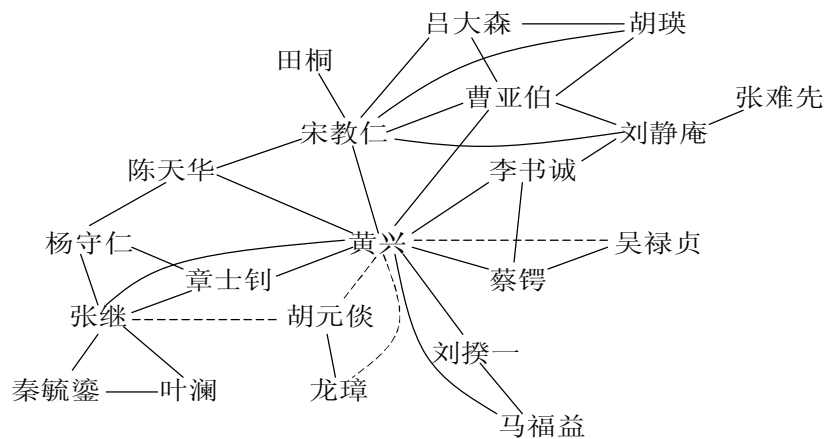
3. 湖南湖北同乡网

与孙中山的广东同乡网、光复会的浙江同乡网相比，华兴会的网络跨越了省界，同学、同乡、同事等关系构成了重要的联结，使两湖志士联合起来。1898 年，黄兴入武昌两湖书院就读，在校期间，与章士钊、曹亚伯相识^[26]。1902 年黄兴进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航程中与多位湖北籍学生结成挚友，其中包括李书诚，随后与同学蔡锷、杨守仁一同编辑杂志并创立翻译社；此外，黄兴的同学中还有刘揆一、胡元倓、胡汉民、廖仲恺等人^[27]。

1903 年 11 月 4 日，黄兴以庆贺三十大寿为名，邀约刘揆一、章士钊、张继、陈天华、宋教仁等人在长沙集会，商议筹设革命团体等事项^[28]。成立之初，华兴会的活动经费几乎全数来源于成员各人的私人财产^[29]。1904 年，宋教仁赴湖北联络，与吕大森、曹亚伯、田桐共组科学补习社。与此同时，凭借刘揆一及其父亲的关系，黄兴说服当地会党头目马福益联手在 1904 年起义。通过对网络生成过程的展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网络成员用已经原本有的社会关系建构出更大的网络的轨迹。

综合上述资料，华兴会 1904 年的革命行动中的社会网络从下图可见：

1904长沙起事时社会网图示



这张社会网主要是由同乡、同学、同事三种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跨越湖南湖北两省。在这张网中，黄兴是中心人物，他的同学、同事关系使华兴会顺利召集人手筹划起义；而宋教仁则在赴湖北联络的过程中发展出自己的网络，是华兴会网络中的次要人物。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三个革命群体从原本就存在的私人网络构成。鲜明的地方性、直接接触、强连带，意味着网络成员具有充分的信任，各成员与中心人物的关系带有比较明显的私人效忠性质。当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陶成章等网络中心人物赋予这个革命网络一定的行动目标之后，网络成员即纷纷利用已经原本有的社会关系来联络更多的革命者，所发生的革命行动也总是一再地在有私人网络覆盖的地方出现。这就是广州起义、长沙起义、大通学堂、安庆起义的组织过程的最重要特质。在这个阶段，孙中山还只是广东同乡网的中心人物，广东同乡网、浙江同乡网、两湖同乡网三个以反清为目标的网络各自行动，纷纷在其成员的家乡发起革命。相比较之下，孙中山在海外的社会关系更丰富，有着一张为其提供革命经费的粤籍华侨网络；陶成章在浙江则拥有贯穿省内乡县的社会网；黄兴、宋教仁的社会网联系了两湖志士，但网络的财政自足程度稍差。

从资料上看，同乡关系并不仅仅是用以寻找志同道合者的源泉，也是一个包含、激发信任与相互支持的身份，毕竟革命是一个风险巨大的行动。而这三个网络的出现以及其集体行动，也意味着当时革命以社会网为基础，其政治、财政、军事资源也蕴含在网络中。当社会关系能使各地有志于革命的人联结成小团体时，也同样可能会为各网络因为领袖之间的私人关系而互相桥接结成联盟提供了结构基础。

三、同乡网络的合作与大网络的结构

在持续的革命活动组织进程中,人们越发意识到若要取得全国性的影响与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清斗争,需要在原本分隔的同乡群体中建立合作关系。当时,留日知识界人士与流亡革命者所组成的各同省网络之间低密度互联的社会网结构,促成了孙中山通过建立不同身份成为诸群体间的桥接者,并成为事实上的革命领袖。

1. 同乡网的相互区隔

20 世纪初,清王朝内外交困,满清政府在很多留日学生的心中简直就是腐败、专制、落后的同义词。当时,君主立宪改良论、共和革命、民族革命、开明专制、地方自治各省独立等学说一时风起云涌百花齐放相互竞争^[30]。而由清政府改革所推出的各省军校、留学团体,以及在日本新成立的如东京振武学校、弘文书院、士官学校等正式机构,更为各省内的学生、军人建立社会联系创造了重要条件,而且,这些正式的教育过程似乎比非正式的断断续续的教育过程更能造就一种团体内部的共识和稳定的私人联系。以当时纷纷出版和发行的以宣传新思想为主的杂志为例,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新湖南》、《四川》、《河南》、《新广东》等,有两个共同特质:其一,它们纷纷以自己所在省来命名;其二,在政见上相互竞争。这些杂志本身既是活跃的社会交往的产物,也能循网络而获得大量读者并就此将观点扩散出去^[31]。这些留日反清积极分子的私人关系令此时各省省内的社会网络已具雏形,这一省级网络贯穿乡、镇、县,具有联合同学网络、军人网络、会党网络等各团体而成为一省内的政治联盟的潜质。

各种各样的关于国家未来的构想和学说的纷繁,各种革命团体如浙学会、光复会、爱国学社、兴中会、科学补习社的出现,都说明这种省级网络也就只能在省级将人们联结起来并使各自群体内部拥有共识,在全国范围上,并未出现一种可以替代“王朝”的共同想法以及具体的行动纲领,而且这些群体各抒己见、互竞雄长,既同样表达对清政府的不满又有不同政治学说之间的竞争。

各省网络内联结紧密,行动频繁,成员同质性强,但缺乏一种整合的力量,使区隔的社会网连结成一个具有一致利益和合法性资源的大网络。这就是当时在立志推翻满清的人群中的结构状况。

2. 孙中山桥接诸同乡网

当时矢志推翻满清的各个留日群体尽管缺乏合作，但号召团结的呼声已经出现，从潜在的联结转变为现实的联结也是可能的。这一节将论述孙中山如何将分隔的网络桥接起来。

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朝使馆关押，史称“伦敦蒙难”，当事人、史学界历来对孙中山这段经历争论不休^[32]。但没有疑问的是，康德黎1897年出版的《伦敦蒙难记》、宫崎寅藏1902年写的《三十三年之梦》、章士钊1903年翻译的《孙逸仙》这三本著作对孙中山的声誉的建立和扩张有着巨大的作用，这几本书与前文所提及的各省团体的杂志一样，既是社会网的产物，也能循网络而获得大量读者并逐渐令孙中山的反满英雄形象深入人心。

孙中山1897年8月抵达日本，结识宫崎寅藏^[33]。1898年，宫崎寅藏与陈少白相识，宫崎因而看到了陈所有的《伦敦蒙难记》^[34]。在对孙中山持续的不断加深的了解之后，1902年，宫崎寅藏写作出版《三十三年之梦》，章士钊随之翻译成中文版于1903年出版，介绍了孙中山广州起义、伦敦蒙难、惠州起义等反抗清朝的经历。这几本书的出版引致孙中山的形象大幅变化，对孙的英雄形象的塑造至关重要^[35]。

形象的转变可通过秦力山、章士钊在书店序言中获得印证。秦力山原先印象中的孙中山只是“广州湾之一海贼”，后来顿觉孙是一个抗击腐败清朝的先知英雄，“举国熙熙攘攘，醉生梦死，彼独以一人图全国之光复，得非天赐其衷之勇者乎。”章士钊在序言中更是直言：“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36]。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英雄典范塑造是以孙中山个人社会网为基础的。为加强论证，在此以与孙中山同时参加、组织两次起义的杨衢云的遭遇作一番比较。杨在两次起义中所冒的风险并不比孙所面对的小而名气却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他没有孙中山伦敦蒙难后康德黎著书宣传的经历、宫崎寅藏那样为其鼓与呼的朋友，而正是这些朋友的相助，使孙名气大震，成为一位公认的反满先锋，一个具有超越个人关系网和私利的伟大目标的救国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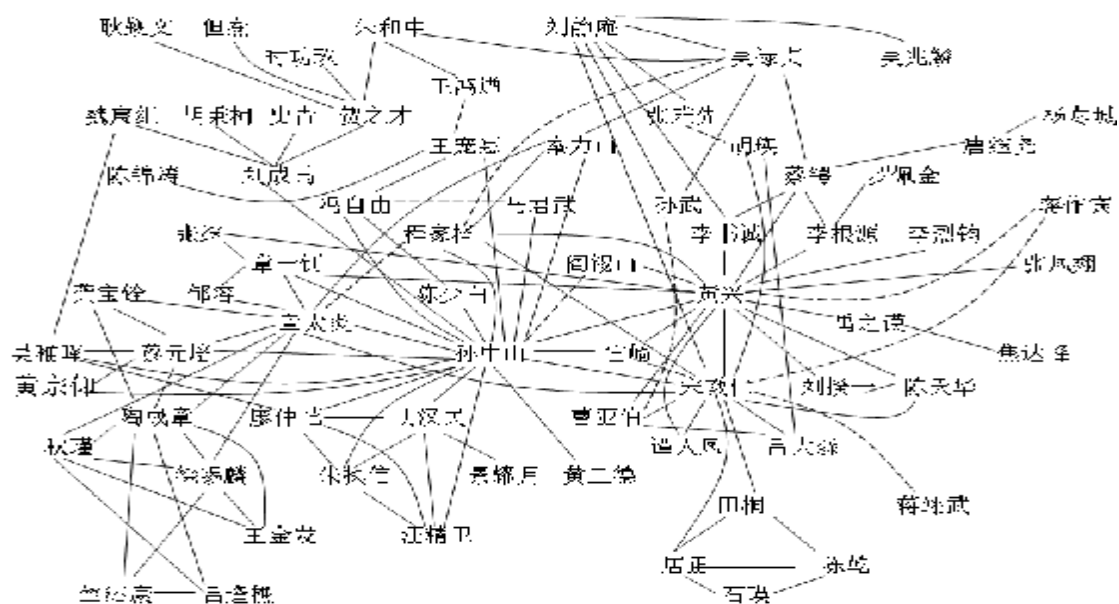
随着孙中山成为中国共和革命的象征和政治正统的来源，各个留日反清群体才有了合作的可能。附着于英雄形象上的合法性资源是当时将潜在联结转变为现实联结的重要动力^[37]。虽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所有被连结的人都怀抱共和理想，行动者的动机是多样的、混合的。

1905年7月，孙中山回到东京。此时，孙中山在革命事业上的名声已经响彻一方^[38]。

先前宫崎还先后与宋教仁、黄兴等商议在孙中山到日本后组建革命大联盟事宜。孙中山回到日本后,经宫崎寅藏介绍而结识黄兴、宋教仁,三人共同商量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联盟^[39]。

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筹备会，8月20日，同盟会正式在东京开成立大会，公举孙中山为总理。基于各省网络的成型，各省主盟人的安排也以其省籍为依据^[40]。不过，华兴会员当时并不是所有会员都加入了，但两湖志士成为同盟会的骨干则是事实。相比之下，兴中会网络中的成员逐渐淡出，广东留学生则声名鹊起。另外，光复会并未并入其中，光复会部分成员因应私人关系而加入，如章太炎、秋瑾、陶成章，同时依旧以光复会名义行事^[41]。稍后，东南亚多个国家、檀香山、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法国等孙中山建立了一定社会关系的地方都设立了分支同盟会^[42]。社会网对革命号召的迅速扩展所起到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1906年6月，因《苏报》案而入狱的章太炎刑满释放后到日本，孙中山邀请他加入同盟会并出任《民报》的主笔。到了1906年年中，孙中山个人革命网的规模远胜过往，通过各个关系人，这张网络涵盖了留欧学生、留日军校生、留日知识分子、两湖志士、浙江光复会、海内外广东同乡等各群体。简而言之，各网络的联结嵌入于这些小网络的领袖的个人关系之中，从而使这种构建大网络的方式成为个人之间信任形成的微观过程的反应。总体情况参见如下网络结构示意图及表格：



按照籍贯来划分, 则提供了另一个认识网络内部结构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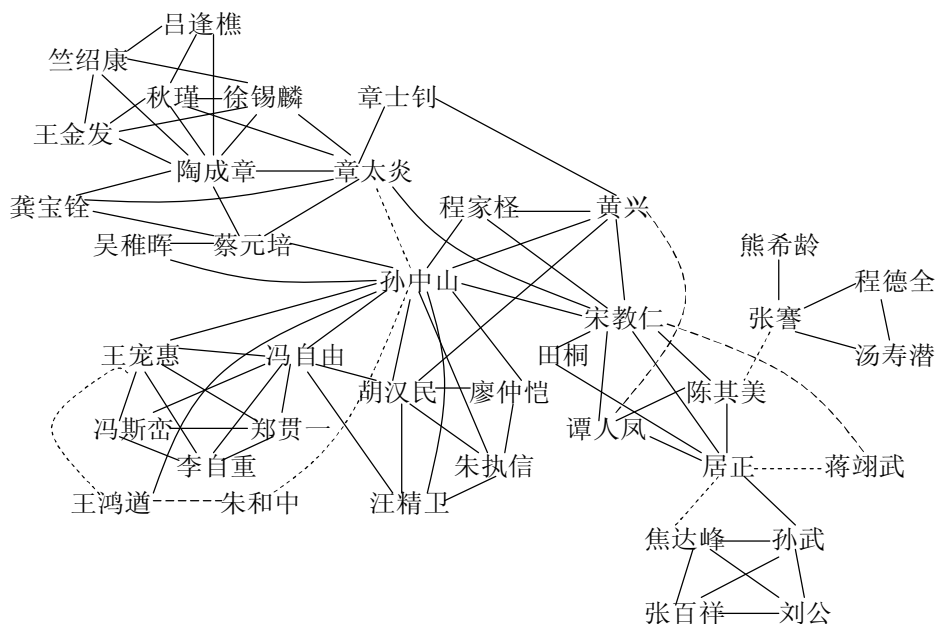
籍贯		籍贯		入会地点	
省区	人数	省区	人数	东京	863
广东	161	直隶	35	新加坡	32
湖南	158	云南	27		
四川	127	福建	24	吉隆坡	31
湖北	124	浙江	22		
安徽	59	河南	9	欧洲	20
山西	55	贵州	9	河内	10
山东	53	江西	8	香港	8
广西	43	陕西	4	总计	964
江苏	37	总计	964		

注：表格来源：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350～351页，1905、1906年成员统计。

凭借与广东同乡、章太炎、陶成章、黄兴、宋教仁等人的比较良好的私人关系、信任和磋商，以及，一种反清革命英雄的形象，孙中山桥接了各个主要的同乡网络，大网络围绕着共同或相似的目标而迅速得以建立，孙中山也成为革命领袖。在这个合作关系网络中，建立于地缘关系的强关系成了大网络的基础，适度嵌入在整体网中的同乡网为革命行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支持。

3. 大网络内部的合作与竞争

这个由孙中山联结的革命大网络有一个鲜明的结构特征：虽然孙是各网络的桥接者，但在由几位领袖商议而成的新网络中，原属各群体的人缺乏足够的横向联系。具体而言，孙中山与以宋教仁为中心人物的小群体、以章太炎陶成章为核心的网络的联系是通过这几位直接关系人来建立的，孙中山的广东同乡网、陶成章章太炎的光复会网络、宋教仁的网络中的成员之间缺乏互动和连结。三个网尽管由孙中山联结并有一定的组织性，但在很大程度上依旧依靠各自原有的网络展开行动，附着在原本私人关系中的资源并未被整合到新网络中。



1906年末三大网络合作时所联结而成的社会网

孙中山与其广东同乡所结成社会网内聚性非常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朱执信、王宠惠等人一直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据胡汉民回忆：“与共晨夕……汪、朱器量之宏远，心思之缜密，皆足以匡余不逮，则交益深”^[43]。可见该网络内各人之关系也相当紧密。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同事。胡汉民担任同盟会评议部议员，后任执行部书记，汪精卫担任评议部议长，朱执信担任评议部书记，廖仲恺担任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1905年《民报》创刊，胡汉民主编了第1-5期，根据孙口授写成《民报》发刊词，先后在《民报》发表“民报之六大主义”、“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等文，与康、梁保皇派展开论战；汪精卫发表在《民报》上的政论文章，使革命呼声深入人心。孙中山和胡汉民汪精卫的关系是同时具有同乡、导师学生、同志性质的强关系，而这个广东同乡网的成员也一直都是孙中山的强力支持者。

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后，孙中山派人将其接到日本并委托编辑《民报》，与康有为一派展开论战。其时，主编该报的有宋教仁、张继、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人^[44]。之后，尽管同事《民报》，但章太炎与胡、汪并未达致共识、存在政见角逐并不断有冲突^[45]。另一方面，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等人在种族革命的宗旨下，在国内的活动主要放在与秘密会党和新军的联络上。徐锡麟联络闽浙会党；陶成章则与长江流域的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头目联系；秋瑾自日本回国后，以大通学堂为掩护，召集浙江会党骨干为学堂学生。及后所发动的行动也是以“光复会”的名义进行的。

这时期，宋教仁在维持与黄兴、张继、田桐等人的关系之外，主张革命、建设均需具备

专业知识的人才，故在编辑《民报》同时决心求学。这段经历奠定了他后来政治思想和联盟活动的基础。1906年7月，宋、章初见，素来恃才傲物的章太炎即与宋教仁谈论哲学，从此二人成为莫逆之交，虽有政见分歧但始终有来往^[46]。

大致而言，孙中山与章太炎陶成章的关系是部分合作的关系，章太炎主编《民报》既有宣传反满但亦有对自己的主张的宣传，而陶成章在国内的行动更是一直以光复会的名义进行；宋教仁的政治理想与奋斗方式都与孙中山的不同，但两人由反满的目标以及黄兴的调解而建立联系共同行动。

由此可知，各人虽然共存在孙中山的个人网之中，但动机是混合的，相互之间从政见到发动革命的地点、方式等方面，也存在各式各样的竞争。于是，尽管这几张次网络由孙中山连接起来并有着近似的主张和目标，但陶成章与孙中山各自的同乡关系网络的内聚力始终很强而且互相分隔，未能通过成员相互的连带而构筑进一步共同行动的结构基础，反而埋下了相互攻击、令孙中山左右为难的伏笔。究其原因，革命不但是一个合力推翻旧统治者的过程，也是革命联盟内部个人抱负、政见、权力竞逐的过程。孙中山个人革命网能否团结行动视乎孙中山是否协调到与各网络中心人物的关系。

四、同乡网过度嵌入的负效应

正如上文所示，社会网是革命的基础，我们也发现，孙中山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是有差别地渗透在各个互隔的网络之中的。各个子网络已经成型且自身具有强烈的地方性质与直接接触的强连带，相互之间也存在竞争的可能。这使孙中山必须在与章太炎、陶成章、宋教仁等人交往时发展出具有特定内容的连带才能与各个网络的人建立联系。以下将说明，过度嵌入的同乡网为孙中山提供支持的同时也使政治行为演化为派系争斗，这使孙中山的自主性和收益下降。

1. 多重社会网中社会连带的结构与内容

从大网络的结构来看，多重而分隔的网络由孙中山与其直接关系人连接起来，各个小网络内部集中度较高而且稳定性较好。各同乡网中的个人政治效忠对象是网络中心人物而非组织或超越具体社会关系的目标，这意味着，子网络中心人物在大网中的地位是靠对其同乡

网成员的领导来维持的。在结构上,一方面,孙中山与其他网络的中心人物构成一张嵌入于整体网中的关系网;另一方面,各个同乡网也嵌入在整体网中并具有过度嵌入的特征。孙中山同时身处精英网、同乡网、整体网之中。从社会关系的内容上看,孙中山、宋教仁、陶成章、章太炎等人继续依靠各自原有的网络展开行动,附着在原本私人关系中的资源并未被整合到新网络中,说明信任、资源、权威等领袖建立领导权的基础是过度嵌入在个人网中的。这种网络结构令孙中山的革命领导权受到相当大的约束,他的决策与行动会受到他与直接关系人的关系以及各人力量对比情况的制约。

下文将孙中山与各个子网络的社会关系分为水平、等级两类:水平方向的关系涉及信任、合作问题,等级关系则意味着权威、资源调配问题。然后以此把握在孙中山个人革命网的结构和个人行动互动与变迁的过程中,同乡网的过度嵌入如何令孙中山失去竞争优势。

2. 过度嵌入的负效应:信任流失、资源竞争、权威弱化、目标差异

孙中山在桥接位置上短暂获得了竞争优势,但互相隔绝的子网络内部的集中性、稳定性使个人之间的不和极易转变为网络之间的攻击,令同时身处多个网络的孙中山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况,过度嵌入的负效应日益明显。

(1) 信任流失

社会连带的存在,为人们之间带来了信任^[47],但当孙中山的个人关系网是有程度差别地渗透在多重且互隔的网络中时,社会关系所提供的信任程度也有差别。

1906年9月,宋教仁在听完黄兴介绍孙中山在南洋、西贡、香港的活动之后,向黄兴指出,孙中山等人一心要在中国南部边疆起义,是“冒险心、激进心太甚,将来恐有孤注之势”^[48]。1907年2月28日,宋教仁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对孙中山的评价,认为孙中山处事不能开诚布公,待人不能虚心坦怀,做事专制跋扈。他对孙中山的这些行为颇为不满,有另觅出路的打算^[49]。可以说,宋教仁对孙中山独断专横的行为十分不以为然,因而对孙并不信任和亲近。这种不满改变了宋教仁最初对孙中山的尊崇和紧密合作的关系。

1907年3月4日,日本政府劝说孙中山离开日本,孙接受日本政府礼送的一万元和铃木久五郎馈赠的五千元,答应离开日本。6月,孙中山在日本秘密订购了一批军火。章太炎与宋教仁得知这批军火是过时款式后,给香港《中国日报》社发去电报要求孙中山另购一批新式枪械。胡汉民将电报转告孙中山,孙则以事属军事秘密,而章太炎以明码发电,是有心

破坏，大为光火^[50]。7月，孙中山和汪精卫、胡汉民决定前往新加坡、安南（越南）等地开展活动。临行前，他给《民报》社留下了2000元的办刊经费。几天后，同盟会的成员才得知孙中山已离开日本，只留下小笔款项。章太炎、陶成章由此认定孙中山滥用捐款，章把挂在《民报》社墙上的孙中山照片取了下来，寄给同盟会香港分会，附言说：“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并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51]。后来，经过黄兴的努力^[52]，改选风波逐渐平息，但失去了互信，同盟会内部从此人心涣散、内斗不止。

这件事表明，孙中山的不辞而别导致了原本就不深厚的信任开始流失，孙中山与宋教仁、陶成章、章太炎的社会连带出现裂痕，早前获得桥接位置的孙中山在大网络中的地位开始动摇。

（2）目标冲突

围绕孙中山共和革命号召而联结的社会网是一个带有一定目标的个人网。但当目标有异时，网络很有可能就会瓦解成若干小团体，在分化的时候，处于桥梁位置的孙中山已经无法掌控局面，各网络的合作也难以为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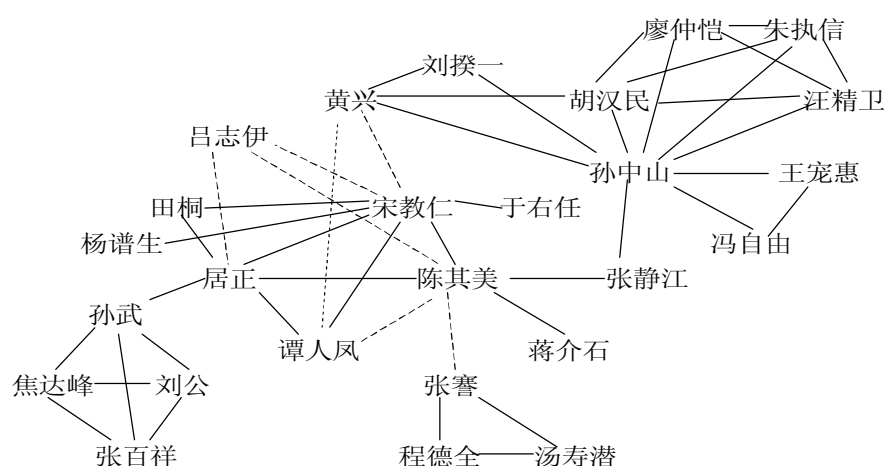
1910年，宋教仁要求孙中山重整混乱的党务，孙中山却回应：“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53]，第二天，谭人凤指责孙中山：“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孙中山推托过几日再议论，但随后“暗地而来者，又暗地而去”，谭人凤因此“大不嫌于中山”^[54]。便与宋教仁商议另组同盟会中部总会。

稍后，谭人凤与一直拥护孙中山的胡汉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胡对前往香港等地募款的谭等说道：“东京一勤学舍，尚不能维持，何足言办事？因改组而又将有无谓之总理问题发生，非笑话乎？”谭人凤则回应道：“本部在东京，总理在西南无定踪，从未过问，总于何有，理于何有？”翌日又奉劝胡汉民莫再只注意在华南发达革命忽略全国其他地区^[55]。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宋教仁与黄兴一直作为紧密联系的伙伴共同行动，但黄兴长期追随为宋教仁所不赞同的孙中山的计策，令两人关系日趋紧张。1908年，黄兴在云南河口之役惨败，返回东京后，宋教仁并未找他讨论革命事宜，当章太炎建议黄兴去与宋教仁商量时，黄兴回答道：“人云钝初狂，下视仆辈，闻其言曰‘不杀孙黄大事不可就’，是何嫉我之深也”^[56]。最后在章太炎的调解下两人才肯相谈，但也不欢而散。

1911年7月31日,对孙中山固执华南革命政策不满的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在上海正式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湖南)、陈其美(浙江)、谭人凤(湖南)、杨谱笙(浙江)、潘祖彝(福建)五人各兼庶务、会计、交通、文事、财务部长。陈其美、谭人凤、居正、杨善生等人分别负责沪苏皖湘鄂等地的革命事务。中部总会虽然冠以同盟会的名义,却不再接受孙中山以及名存实亡的同盟会东京本部的支配领导。

1911年宋教仁另建同盟会中部总会时的革命网结构示意图



这段经历说明了当大网络中的子网络目标与网内其他群体的目标迥异时,会出现一个网络分化与重组的过程,致使处身连接的人失却控制利益,未必一定能持续协调各群体合作。

(3) 权威弱化

之前提及,孙中山的权威在于他是中国共和革命的合法性来源与象征人物,他也因此而能够成为革命网络的领袖。但各同乡网络的始终分隔,令孙中山经常面临被各个子网络不断撕扯与怀疑的境况,这最终瓦解了孙中山作为中间人的权威,使其不再能自如调度网络资源、协调共同行动。

1907年2月25日,宋教仁与黄兴、孙中山、章太炎、胡汉民、宫崎寅藏等人,在“艺妓七八人轮流奉酒……歌舞并作”的情况下欢聚一堂。2月28日,宋教仁在日记中记录了发生在孙中山与黄兴之间的激烈冲突:“庆午忽言,欲退会,断绝关系,(孙中山)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不如另外早自为计”^[57]。孙中山的固执行为令宋教仁不满的同时也萌生另起炉灶的想法,孙中山原有的权威已经随着其独断行为而弱化。

同在1907年,发生了孙中山携带资金不言而别的事件,自始不断被革命网中的其他人攻击其失信、只信任几位广东同乡。

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后来持续攻击孙中山,令他的声誉大受影响。1909年11月,孙中山写信给吴稚晖,提及他因与陶成章反目所受到的声誉损失。“惟被陶布散传单之后,新得革命思想之人对于弟之感情大不善”^[58]。此后12月13日和16日接连给吴寄了三封信,一再恳切希望吴出来批章,“因太炎向负盛名,且有上海下狱一事为世所重”,“因海外革命志士,多以太炎为吾党之泰山北斗也”^[59]。可见孙中山的权威面临竞争者的威胁。在这段时期,孙中山与广东同乡网之外的人已缺乏起码的互相信任。1909年5月,他在远走欧洲前委托自己信任的胡汉民负责南洋党务,10月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以胡汉民为支部长,发号施令,俨然东京本部外的另一总部。孙中山甚至一度想舍弃同盟会之名,另组新团体。1909年11月12日,他给张继的复信中说:“所云从新组织团体,弟在南洋已有行之,是以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前、去两年,两广、云南之起兵,皆奉革命党本党之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60]。被迫考虑组建新团体,意味着孙中山对原有网络的控制权已经旁落;而孙中山及其广东同乡的行踪与经费流动、革命地点的吻合也能说明,行动与人事高度嵌入于一个强关系网络中。

1910年6月,孙中山返回日本,宋教仁要求孙中山整顿党务,孙中山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问缘故,孙说:“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次日,谭、宋二人复见孙中山,不意孙中山“仍持此种论调”,谭人凤随即驳斥,指责孙中山不公开经费使用情况^[61]。由此可见,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受到了强烈质疑和严重挑战。

(4) 资源竞争

在革命大网络中,原本已经成型的以陶成章为代表人物的子网络,与比邻共存的孙中山的广东同乡网形成一种并列结构。由于各个同乡网络的领袖自身的同乡网过度嵌入于整体网中,当孙中山与陶成章的关系弱化时,局势就可能迅即变成网络间斗争,各网封闭网内资源,相互展开竞争,从而削弱孙中山通过嵌入性而获得的对网络的控制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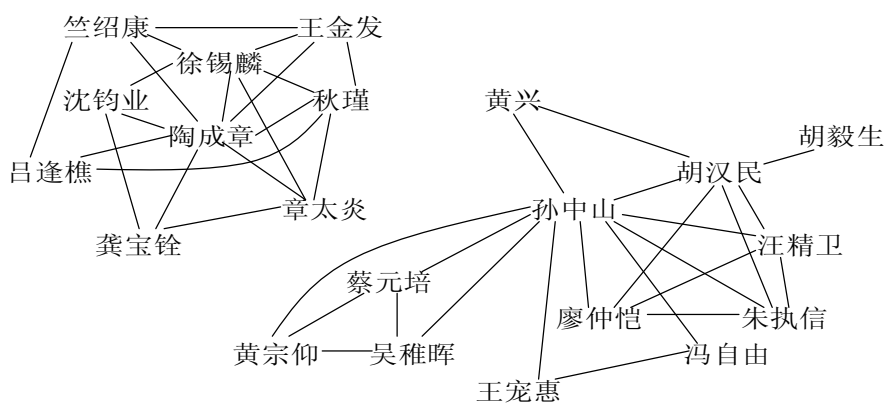
1907年秋天,陶成章联合流亡在印度和东南亚一带的革命者组成“东亚万国同盟会”,推章太炎为会长。1908年4月到7月,陶成章一度接办《民报》,当年9月,陶想在南洋华侨中筹款,请孙中山作函介绍,孙不答应^[62]。陶对此不满,认为是孙中山派人宣传他是

来旅行而不是为革命筹款，并最终致使筹款不足，难以开展革命^[63]。

在同一个名义下无法争取到经费令陶成章随后决定独自行动，到缅甸、爪哇等地演说，并将浙江革命史写成《浙案纪略》，在缅甸《光华日报》陆续发表。不久后，孙中山与汪精卫复办《民报》，但将章太炎排斥在外^[64]。章太炎知情后大怒并发表《伪民报检举状》指责孙中山自恃《民报》的鼓吹和盟友的拥戴，趁机敛财自用而不愿意分配经费予报社和陶成章^[65]。陶成章、章太炎的倒戈使孙中山的筹款受到很大障碍^[66]。

孙中山与陶成章、章太炎相互的不信任和资源竞争越演越烈。陶成章觉得与孙中山已势不两立^[67]，章太炎也因《民报》之事而“大恨孙文”^[68]。孙中山回应诘难，指责二人“陶之志犹在巨款不得乃行反噬，而章之欲则不过在数千不得乃以罪人。陶乃以同盟会为中国，而章则以民报社为中国”^[69]。这段话反映出，原本应属于整个网络的报社、组织已经褪变成子网络之间争夺权力的场所与工具。

在一片互相攻击的气氛中，革命网也发生重组。1910年2月，陶成章重组光复会，在日本东京设立总部，在南洋各地设分会，另树一帜，与孙中山胡汉民黄兴的同盟会南方支部分庭抗礼。



章太炎、陶成章与孙中山决裂后的社会网结构图示

四分五裂各自竞逐的格局说明，子网络稳定性会削弱大群体的统一性，当小群体与大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强度不足、信任薄弱时，革命网中所蕴含的资源就很难被有效运用、各网难以合作，而且，网络领袖之间的关系恶化很可能引发团体性的资源争夺甚至另立团体。这些情况都严重削弱了孙中山的权威与声誉，整张革命网的分化趋势越发明显。

3. 小结

以上四小节分别揭示出，过度嵌入情况下，处于桥接各个子网络位置的行动者失去竞争优势、被负效应支配的四种表现：

（1）信任流失：孙中山渗透在大网络中各处成员的关系强度、内容有别，从而导致了网络内各处对孙中山的信任度不一，相互之间极易纷争不断，令孙中山非但没有享受到嵌入性所带来的信息、信任利益还经常被来自不同网络的人质疑；

（2）目标冲突：革命目标不断调整、革命者相互竞争的过程，令抱负不同的革命者之间的直接连带断裂，难以持续合作；即使相互之间尚有第三方关系连接，仍然令桥接者失去领导权；

（3）权威弱化：各分隔网络对桥接者的质疑和挑战使其权威弱化，控制利益、信息利益不复存在；

（4）资源竞争：当小群体与大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强度不足、信任薄弱时，大网络中所蕴含的资源就很难被有效运用，各网络之间会随着领袖之间的竞争而展开资源争夺，致使结构洞位置上的领导权被削弱、大网络资源耗散。

本文至此已论证了孙中山在其个人网的结构变迁进程中是如何建构不同的网络的，各个持有自身目标的同乡网络的在大网络中的过度嵌入如何影响孙中山的行为。孙中山通过各个直接关系人而与各同乡网络联系，但由于关系人是内部联结紧密的网络的代表，会因受到强关系的压力而成为为小群体利益最大化而筹划的人，与此同时，他在大网中的地位也由所领导的小群体势力决定。故孙中山与各直接关系人出现力量对比关系，决策和行动均会受到这种格局的制约。简而言之，过度嵌入于大网络的广东同乡网为孙中山提供信息、资源利益和竞争优势的结构条件，但各个网络之间的同样进程也会造成桥接人收益弱化并陷入竞争劣势。

五、结论

本研究在运用了充足的、能够反映孙中山个人网络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探讨历史进程中一个社会群体是如何出现以及各个社会网是怎样被桥接的。本文的观点是，同乡身份作为一种备受信任与认可的身份认同，被孙中山、陶成章、宋教仁等各自同乡网的中

心人物不断应用到与同乡的联系之中,随后,经过孙中山对不同同乡网络的桥接,建立于地缘关系的强关系成了大网络的基础,而网络的核心则是由跨越了同乡关系的精英所构成。这两种合作的逻辑同时存在,为同乡子网络与大网络的嵌入关系带来巨大的张力。附着于孙中山的中国共和革命的象征和政治正统的来源,是当时将潜在联结转变为现实联结的动力,尽管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所有被连结的人都怀抱共和理想。在组建革命大团体后,孙中山成为实质上的革命领导人。但是,与合作性的整体网络性质不同而且过度嵌入的同乡网之间的相互竞争却令孙中山不断遭受诘难和质疑。这些呈现出庇护依附特点的关系使各人获得政治支持,但却未令各子网络的合作关系更加顺利,反而使同时身处多个网络的行动者不断遭受冲击。由此本文提出过度嵌入的四个负效应——信任流失、目标差异、权威弱化、资源竞争。

与乌兹关注嵌入程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不同的是,本文不只注意到嵌入性对行为后果的影响,也指出了嵌入策略、过度嵌入也对行动领域内部的结构关系产生影响,并且具有形塑行动领域的性质的作用。具体而言,各人利用自己的关系寻找与同乡网络形成逻辑来进行政治参与,在孙中山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度嵌入的网络的典型特征:孙中山与广东同乡在地缘认同基础上建立庇护附庸关系;同样的逻辑也被其他同乡网络中心人物运用。假如将视野拉阔就可以看到,社会网络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对长达16年的推翻清朝的革命进程的多重影响。各种精英不断复制孙中山等人的做法,运用个人关系获取政治资源、角逐政治地位的过程本身形塑了中国当时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行为。与历次朝代转换相比较,1911年辛亥革命的最大特点在于其采取的是各省独立这一形态^[70]。但与此同时,相互竞争的网络令民国政府在创立之后即面临中央财政被地方势力截留^[71]、军阀混战连年的局面^[72],这些历史事实都印证了本文的判断:社会网络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

然而作为探讨社会网理论基础概念和理论的研究,本文仍存在着问题,这反映在作者虽然使用了历时的、动态的资料论证了过度嵌入对行动者的各种影响,但这个研究的推广范围可能有限,这个问题是由历史背景和中国社会的特性带来的。首先,从清末到民初的转型蕴藏多种变迁的可能性,革命历程更是包含巨大的复杂性。变革图强的奋斗,寻找经费的艰难,军事行动的筹划,风云变幻的时局,这不同寻常的一切带来了个人社会网的不断建构和网络之间的合纵连横分道扬镳剧烈竞争;正常社会秩序下未必会出现如此复杂的局面。其次,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一个人的名誉与角色是被其身处的社会网络定义的,这意味着孙中山桥接着过度嵌入在由各自同乡组成的私人网络;其后果就是一旦私人关系有变,很容易从个人之间的反目成仇引发网络之间的势同水火,令中间人无所调适。此外,使用历史档案资料来

进行社会网理论的论辩在学界也不是一种常见的方法,其普遍性和启发性也有待学界同仁评议。

参考文献:

- 【1】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 J. Sociol.* Vol. 91, No. 3, pp. 481-510
- 【2】Uzzi, Brian, 1996,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 the Network Effect,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1996, Vol 61
- 【3】Uzzi, Brian, 1999, “Embeddedness in the Making of Financial Capital: How Social Relations and Networks Benefit Firm Seeking Financing”,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1999 Vol 64.
- 【4】Uzzi, Brian, 1997,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42, No. 1 (Mar., 1997), pp. 35-67
- 【5】麦克利恩、帕吉特, 2008, “文艺复兴时期经济中的责任、风险和机遇: 走出社会嵌入进入网络共建”; 选自: 高柏编, 《经济社会学》,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6】同脚注 4.
- 【7】韦伯, 1922/1978/2010, 《经济与社会》, 156-161、169-171 页, 阎克文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施耐普、圭伦, 2008, “公司的治理、合法性与模式”, 选自: 高柏编, 《经济社会学》,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8】赵鼎新, 2006,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2-6 页,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9】佩罗, 2008, “组织美国”; 高柏, 2008, “政府与行会经济秩序: 卡特尔和产业行会在日本的制度化, 1931 年至 1945 年间”; 选自: 高柏编, 《经济社会学》,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0】赵鼎新, 2006,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240-243、302 页,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1】Uzzi, Brian, 1997,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42, No. 1 (Mar., 1997), pp. 35-67; Granovetter, Mark, 2000, “A Theoretical Agenda for Economic Sociology”, *Economic Sociology at the Millenium*, edited by Mauro F. Guillen etc.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1; Burt, Ronald, 2000,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 in B. M. Staw and R. I. Sutto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msterdam; London and New York: Elsevier Science JAI, 2000, pp. 345-423; Portes, Alejandro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 Rev. Sociol.* 1998. 24:1-24
- 【12】博特, 2008, 《结构洞: 竞争的社会结构》, 1-7 页, 上海: 格致出版社导言,
- 【13】孙中山, 《建国方略》,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 第 229 页
- 【14】冯自由, 1947, 《华侨革命开国史》, 第 32 页, 上海: 商务印书馆
- 【15】陈锡祺主编,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 第 81 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 【16】图为广州起义时的社会网, 强连带为实线, 弱连带为虚线, 作图所用资料来源与注释文献相同; 下同。
- 【17】张玉法, 1975, 《清季的革命团体》, 第 199 页;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 32 集; 1975
- 【18】沈颢民《记光复会二三事》,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 第 131、132 页

- [19] 俞子夷《蔡元培与光复会的草创时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第510页
- [20] 沈光熊《沈钧业传》，《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
- [21] “其时亦无组织，而五人者为之魁，则徐伯荪（徐锡麟）、陶焕卿（陶成章）、沈馥生（沈钧业）、龚薇生（龚宝铨）、陈子英是。”《与陶冶公》，《章太炎书信集》第88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版，马勇编
- [22] 《革命军》序言，《章太炎政论选集<上>》，汤志钧编
- [23] 沈颢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137页
- [24]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章太炎《叙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 [25] 《光复会史稿》，谢一彪，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99-218页
- [26] 毛注青编著，1991，《黄兴年谱长编》，第30、38页；北京：中华书局
- [27] 《黄兴年谱长编》，第40、41、43、44、47、48页
- [28] 关于此次集会的出席人的回忆多有出入；见刘揆一《黄兴传记》，载《辛亥革命》（四）276、277页；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卷，第138页；周震麟《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卷，第330；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卷，第609页
- [29] 《黄兴年谱长编》，第55页
- [30] 佐藤慎一，2006，《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选自沟口雄三、小岛毅编，《中国的思维世界》，58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31] 沟口雄三，2008，《辛亥革命新论》，《开放时代》，2008年04期
- [32] 不同说法详见：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柴德赓编《辛亥革命》第一卷，第35页；罗家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史扶邻，《孙逸仙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11~113页
- [33] 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172-174页
- [34] 史扶邻，《孙逸仙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41-147页
- [35] 黄宇和，2004，《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从未披露的史实》，193-21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 [36] 柴德赓编，《辛亥革命》第一卷，90、91页
- [37] Burt, Ronald, 1999, “The Social Capital of Opinion Leader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66, (Nov., 1999), pp. 37-54
- [38] “于革命名已大震”，宋教仁，《宋教仁集》下册，436页
- [39] 毛注青编：《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4页
- [40]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322~323页
- [41] 沈颢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137页
- [42]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海外各地中国同盟会史略》，第149~173页
- [43]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 [44] 《章太炎年谱长编》，208页，《章太炎自编年谱光绪三十二年条》
- [45] 胡、汪二人所发的主要文章的题目：《发刊词》《民族之国民》《驳革命可以瓜分说》《告非难民生主义者》《论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民报之六大主义》；章太炎及其门生文题：《辩满人非中国臣民》《五无论》《明清最初之交涉》《永明皇帝殉国实纪》《排满评议》《无政府主义序》《人世之悲观》，《民报》，中山大学图书馆方志部影印
- [46] 《宋教仁集》，《我之历史》，1906年7月6日，9月26日，10月1日，10月13日，11月26日，12

月6日,均有记载与章太炎多次长谈;中华书局1981年版,陈旭麓编

【47】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 J. Sociol. Vol. 91, No. 3, pp. 481-510

【48】《宋教仁集》,《我之历史》第四卷,65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陈旭麓编

【49】《宋教仁集》,《我之历史》第六卷,71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陈旭麓编

【50】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35页

【51】冯自由:《胡汉民讲述南洋华侨参加革命之经过》,《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191页

【52】《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页

【53】谭人凤,《石叻牌词》,甘肃出版社1983年版,第80、81页

【54】谭人凤,《石叻牌词》,第80、81页

【55】谭人凤,《石叻牌词》,第81页

【56】《章太炎年谱长编》第258~259页,光绪三十四年条

【57】《宋教仁集》,《我之历史》第六卷,第718页

【58】《孙中山全集》第一卷,425页

【59】《孙中山全集》第一卷,430页,431页

【60】《孙中山全集》第一卷,426页

【61】谭人凤,《石叻牌词》,第80、81页

【62】“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至王子匡(王鸿道)书》,41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63】《孙中山全集》第一卷,《至王子匡(王鸿道)书》,418页

【64】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304页

【65】“恃《民报》鼓吹之文,借同志拥戴之意,乘时自利,聚敛万端。”“夫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计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干没可知已。及去秋有黎姓者自新加坡来云,《民报》可在南洋筹款,即印刷股票数百份,属友人陶焕卿即陶成章带致孙处,而孙坐视困穷,抑留不发。”《章太炎书信集》279~282页,《与南洋、美洲侨寓诸君》,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版,马勇编

【66】《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复吴稚晖函》,428页

【67】陈锡祺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470页

【68】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第167页

【69】《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复吴稚晖函》,第429页

【70】关于各省势力的兴起,有很多成果可供参考:周锡瑞,2007,《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江苏人民出版社;罗威廉,2008,《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何炳棣,1966,《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Mary Rankin, 1986,《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孔飞力,1990,《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1】王耿雄编,1986,《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第10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72】齐锡生,2010,《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rovince Fellow Network and Over-embeddedness: The Transition of Personal Network of Sun Yat-sen, 1895—1911

Yao Shuhe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Sun-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works on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written by Uzzi (1996, 1997) suggest that embeddedness is a logic of exchange that promote efficiency and complex adaption, while in the same process, over- embeddedness would weaken the adaptation of organizations. Based on the data of personal network of Sun-yat-sen from 1895 to 1911,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how Sun-yat-sen bridged several province fellow groups and became the leader of his personal network, however, over-embeded networks of provincial ties points to the lack of complete connections among different networks which causes the context in which Sun-yat-sen suffered suspicion and challenge. At last , this essay points out that the lack of trust, conflicts of objects, competi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loss of authority would lead to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over-embeddedness.

Key words: province fellow network, over-embeddedness, negative effect

收稿日期: 2011-03-02;

作者简介: 姚书恒, 男, 中大社会学系, 本科生, 邮箱: yaoshuheng@126.com

【责任编辑: 赵大英】